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杨 豫 译



Main Trends in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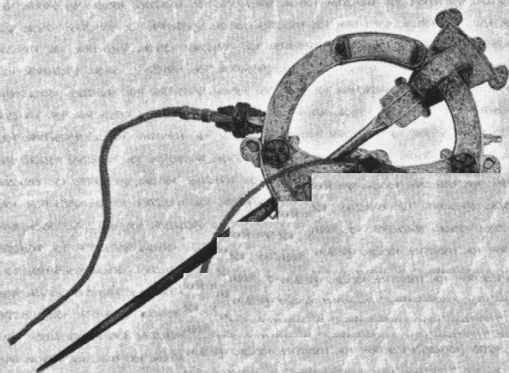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Main Trends in History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杨豫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66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7-301-09102-8

I. 当… II. ①巴…②杨… III. 史学史—世界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621 号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pt. 2, v.1:

Anth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ciences, aesthe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art

© UNESCO 1978.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UNESCO.

中文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授权,据 Mouton Publishers 1978 年版译出

书 名: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著作责任者:[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杨豫 译

责任编辑:岳秀坤

标准书号:ISBN 7-301-09102-8/K·038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3.5 印张 337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治史贯通古今，著述等身，先后执教牛津大学等英美多所著名高校。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著

史学方法论 杜维运 著

变动世界中的史学 杜维运 著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

[英]彼得·伯克 著

责任编辑 岳秀坤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www.qwyh.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fongbook.com

译者的话

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的历史学卷。作者系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巴勒克拉夫学贯古今,除了史学史,对西方上古史、中古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也有极深的造诣,先后执教于英国圣约翰学院、剑桥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布朗德斯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他一生著述甚多,主要著作有《公证员与罗马天主教廷》(1934年)、《罗马天主教廷圣职委任制》(1935年)、《中世纪的德意志》(1938年)、《近代德国探源》(1946年)、《中世纪的欧洲》(1950年)、《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5年)、《英国早期社会生活》(1960年)、《欧洲思想和行动的统一》(1963年)、《当代史导论》(1964年)、《历史与百姓》(1967年)、《中世纪的东欧和西欧》(1970年),他还是《国际事务概览》1955—1956年、1956—1958年和1958—1960年各卷的作者和《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册》(1978年)的主编。

1976年,他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负责本书的起草,在列宁格勒大学教授 I.S. 科恩和哈佛大学教授 K.O. 戴克的协助下,历时两年,完成本书,经过集体讨论后定稿,用英文和法文同时出版。本书中译本按英文版译出,同时参照了法文版。

全书共分七章,对二战后、尤其是 50 年代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历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趋势作了系统、全面、详细的阐述和分析。前三章概括了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历史主义的兴衰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对西方、苏联和第三世界各国历史研究发生重大转变的原因、起点、途径和主要特征以及当代主要

新史学流派的兴起作了精辟的分析;介绍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渗透和交叉的必然性和产生的成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和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并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优缺点,特别是对计量史学的功用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在后四章中,作者着重阐述史前史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历史学的重大发展以及“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消亡。巴勒克拉夫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国别史、地区史与世界史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结论说,目前“真正的世界史”尚未诞生,开展历史的比较研究,尤为必要。对于各国档案馆、文史馆、博物馆、大学、研究所和科学院在历史学研究新方向和新趋势的冲击下,在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引进后发生的组织变化及其积极作用,作者在充分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弊端,并呼吁要高度重视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的重要作用。总之,当前历史学发展趋势中虽存在有待克服的问题,但前途是乐观的。

本书不是按时间先后和国别逐个地罗列各个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著作并加以评价,而是以当代历史学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贯穿全书。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一些国际学术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委员会提供了各国历史研究发展和现状的专门报告。作者还参考了近二十年出版的史学著作数百种,读者从中足以窥见当代历史学研究的全貌。

由于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资料详实,取材广博,评价公允客观,本书被欧美各大学列为史学史的必读参考书,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肯定也会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译者在翻译时得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哈里·狄金森教授的支持和帮助。狄金森教授还特意为中译本写了序言。译者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中译本在译校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先生和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先生的具体关心和帮助,特此鸣谢。当然,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和不足应由译者本人负责。

杨 豫

序 言

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进展。这意味着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但是,比历史知识的巨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如何对过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上发生了重大的革命。近年来,历史学应当研究哪些方面,采用哪些方法,如何对过去作出解释,以及历史研究工作如何组织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教授对当前历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所作的阐述,全面介绍了这些深刻的变化,他的这部著作应当作为每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工作者的必读书。

巴勒克拉夫教授的这部重要著作共分七章。在第一章,他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历史研究的主要变化。他说明了历史学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更强的学科,并且论述了历史学家如何扩大了历史学的范围以及如何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历史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这一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世界各国历史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巴勒克拉夫教授指出,到50年代,任何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否认睿智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态度对历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并且必须正视这场挑战。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二章解释了5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们对新的历史理论和新方法论的探索。他阐明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研究是如何受到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大的影响的。他高度评价了法国年鉴学派等学者,是他们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扩大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化。这一系列的发展要求历史学家使

用新的研究方法,其中主要是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结果,加强了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三章充分而详细地研讨了这些新方法,特别是更为详细地追溯了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他阐述了历史学家如何越来越注重于对追求科学严谨性这一理想的需要。这导致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从特殊转向一般,从表面事件转向内在环境,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为了研究事件在其中出现和历史人物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典型的、基本的结构框架,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家借用了“模式”。在历史学家所采用的新技术中,最重要的往往是以数量巨大、只可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的统计资料为基础的量化分析。50年代以来,量度和量化技术实际上涉及到了历史探索的每个部门。

在第四章,巴勒克拉夫教授阐述了5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家不仅采用了新的方法去研究过去,而且对以往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表示关注。他论述了亚非历史学家以及欧美历史学家对非欧洲世界研究的兴趣的急剧增长。50年代以来,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特别迅速的进展。这些国家新史学的基本特征同西方史学一样,都是优先研究社会和经济问题。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五章着重阐述了现代历史学家近来获得的日益增长的知识如何置于一种体系中才可能使这些知识变得有意义,从而使历史研究得以进行。这引导着历史学家从优先考虑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向对区域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和比较史学抱有更大的兴趣。这还鼓励历史学家去探索人类在社会中进化的完整理论。巴勒克拉夫教授相信,马克思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学家当中是产生了最大影响的解释历史的理论。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六章扼要地叙述了当今世界上历史研究工作是如何进行组织的。他证明了,近几十年来训练有素的、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在数量上不断增长;他们从事的那一类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倾向也在不断地加强。他说明了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越来越

越多的知识如何使他们比过去更加依赖有成效地组织起来的档案馆;还说明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如何由大量的历史学刊物给予发表;他们的研究活动如何在数量越来越多的历史系、科学院和研究所里组织起来。

巴勒克拉夫教授在第七章,也就是结论中考察了 70 年代末历史研究的状况。虽然他看到了一些有待克服的问题,并且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他坚信科学的历史学正在一往无前地迈进,陈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态度正在退却。巴勒克拉夫教授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胜利也许过于乐观了(同时,由于他过多地强调了计量史学,从而忽视了文化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忽视了民众精神的历史),但是毫无疑问,这部著作仍然是介绍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新型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部最优秀的著作,也是一部最基本的著作。对于希望了解历史学这门学科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的每个严肃认真的历史工作者来说,巴勒克拉夫证明自己是一位胜任的专家和导师。他极为公允地评价了这些变化:他赞扬了这些重大的变化,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有必要对有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会抵制这些变化的原因作出解释。

哈里·狄金森

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

前 言

为了不致引起误解,有必要着重指出本书的目的不是全面叙述当前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的历史学著作,而是讨论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大量的历史著作——也许占全部成果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完全是因袭常规的,虽然增加了大量知识,却没有(也无意图)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正因为这个理由,有些著作尽管非常出色,这里也不作专门论述。其次,我关心的重点不是专门史领域(例如科学史、法制史等),尽管其中的某些方面近年来进展卓著,而是对一切地区和国家的所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影响的总趋势。当然,本书写作的总设计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抱那样的期望显然是愚不可及的,更不用说在本书写作中对有关主题的组织结构和选择了。我对自己知识方面的严重不足无论如何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这样,我仍然准备就全球范围的历史学研究状况作一番讨论,因为我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如果说我在本书的写作中避免了错误的话,那是因为许多个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委员会为本书提供了各种报告和意见。这里特别要提到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芬兰、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等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委员会提供和提交的报告和资料以及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和国际历史学委员会协同汇编的许多个人的论著和评论,这些材料都使本书得益匪浅。我想在这个适当的场合特意向我提供报告和文件的各国鸣谢。然而,由于我受惠太多,我无法在这

里向所有的人逐一表达我的谢意。不过,其中许多个人和团体是我必须特别致谢的。首先,我应当向《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的总编辑雅克·哈维先生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如果不是他给予有时陷于困境中的我以不倦的帮助和鼓励,几乎可以肯定,本书是难以完成的。其次,我要感谢两位起草人:I.S. 科恩(列宁格勒大学)和K.O. 戴克(哈佛大学)。我对他们三人的感激之情,远不是寥寥数语足以表达的。此外,我应当向苏联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和基础科学图书馆的F.A. 费多罗娃博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给予的帮助超过了我有期望的程度。我还应当感谢彼得·哈纳克博士(布达佩斯大学)、萨蒂什·昌德拉教授(新德里大学)和萨多诺·卡托迪尔德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印度尼西亚国家委员会协调人),他们起草的报告和分析,在我看来,起了非同一般的启发作用。最后,我应当向J. 德昂特教授(根特大学)、N.A. 埃罗费也夫教授(莫斯科大学)、J.R.T. 休斯教授(美国西北大学)、亨利-伊雷内·马鲁教授(巴黎大学)、查尔斯·莫拉泽教授(巴黎大学)、让·多梅松先生(巴黎大学)、博伊德·C. 谢弗教授(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大学)致以热忱的谢意。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墨西哥驻巴黎大使西尔维奥·萨瓦拉先生,承蒙他读过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坦率和中肯的意见。我还应当向我去过的学生马克·奥洛夫斯基(布朗德斯大学)表示我个人的谢意。他同我进行过多次生动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当然,本书的写作以及其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完全由我本人负责。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但是，还不止于此，对于我们的文明来说，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绝不是历史。

——扬·赫伊津加：《历史概念的定义》

目 录

译者的话 I

序 言 III

前 言 VII

第一章 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

从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 5

第二节 历史主义的危机 1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20

第二章 探索新概念和新方法 35

第三章 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56

第一节 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60

第二节 心理学和历史学 80

第三节 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地位 90

第四节 历史学的计量化 104

第五节 现 状 111

第四章 历史学的新领域 118

第一节 史前史 133

第二节 非洲史 137

第三节 拉丁美洲历史学的新格局 144

第四节 亚洲历史学的当代趋势 153

第五节 第三世界历史研究现状	178
第五章 探索历史学的意义：	
国别史、比较史学和“元历史学”	186
第一节 国别史和地区史	189
第二节 世界史的前景	193
第三节 历史哲学和“元历史学”	206
第四节 比较史学	214
第六章 历史研究工作的组织	225
第一节 史料的获得和档案机构	233
第二节 新研究技术的影响	244
第三节 大学、科学院和研究所	251
第四节 历史学家个人的地位	257
第七章 结语：当前趋势和问题	261
参考文献	274

第一章 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

从 19 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时光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无论是有关历史学的观念及其功能，还是历史学家们对于其工作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因此，本书所叙述的历史学研究的当前趋势自然主要是关于 1945 年以来的发展过程。1939 年以前，大多数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地遵循着老一辈历史学家在 19、20 世纪之交为他们确立的指导方针。1945 年以后，他们开始对战前那种研究方式感到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越来越明显。大约从 1955 年起，历史学研究进入了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从两方面对我们的历史观念发生影响。其最明显的后果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外环境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如果把 1945 年前后的形势——或者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把 1900 年和 1950 年的形势——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将马上发现在四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明显变化。首先，现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其他地区不发生影响，20 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世界的历史。其次，科学和技术不可遏制地进展，在所有地区都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再次，欧洲的重要地位已经下降。欧洲从海外收缩，美国和苏联的优势上升，亚洲和非洲正在崛起。最后是自由主义体系的解体。一种在 19 世纪还闻所未闻的与自由主义体系全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兴起了。20 世纪初，自由民主秩序似乎正在顺利地发展，然而，共产主义制度——1939 年以前仅限于苏联——到 1960 年，已经扩大到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居住的地区。在

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在非洲,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这两种制度相互结盟,却不完全相同。

面对着这样一些根本变化,新一代历史学家当然不能不重新审查他们继承下来的历史观念,这毫不足怪。由此产生的失意和幻灭感甚至早在1945年以前就有所表露。英国牛津大学钦定教授莫里斯·波威克爵士颇带权威性和十分动情地提到了“压迫着思想丰富的历史学研究的那种不安和不适”^①。当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才持有这样的立场。比他还早一代的特勒尔奇和卡尔·豪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对历史主义的“危机”进行过详尽的讨论。^②但是,这种不安的直接影响涉及范围十分有限。旧世界的稳定性明显地在恢复,甚至1929年以后的大萧条也未能使历史学家对他们继承的传统所抱的信念有所动摇。相反,使他们的自信心开始崩溃的却是1939年到1945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欧洲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纳粹在东欧的兽行,使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流离失所,被迫作大规模的新的民族大迁徙,最后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大屠杀。所有这一切都使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再以以往的自满心理去看待历史进程了。“当有人对我们说:去判断查理曼大帝或拿破仑,成吉思汗或希特勒或斯大林屠杀是愚蠢的”,以赛亚·伯林爵士写道。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应当公正地添上克伦威尔的名字。当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历史学家使用的范畴是中性的”,我们的任务仅仅是“叙述”。“对此,我们作出的回答只能是:赞同这些说法便意味着背叛我们的基本道德观念,而且错误地表达了我们过去的认识。”^③对于导致这种方向的历史观念,人们再也无法接受了,对历史思想的基础及其基本观点重新加以考虑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① M. 波威克:《五十年以后》,载英国《历史》杂志,第29卷(1944年)。

② E. 特勒尔奇:《历史主义及其问题》(E. Troeltsch,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蒂宾根,1932年版。K. 豪西:《历史主义的危机》(K. Heussi, *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蒂宾根,1932年版。参见 G. G.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米德尔顿,1968年版,尤见第7章。

③ I. 伯林:《历史的必然性》(I.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伦敦,1954年版,第76—77页。